

Why Research Universities Should Be Led by Top Scholars

世界一流大学： 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吗？

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经济发展所需的专业人员、高水平专家、科学家以及研究人员方面，在创造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新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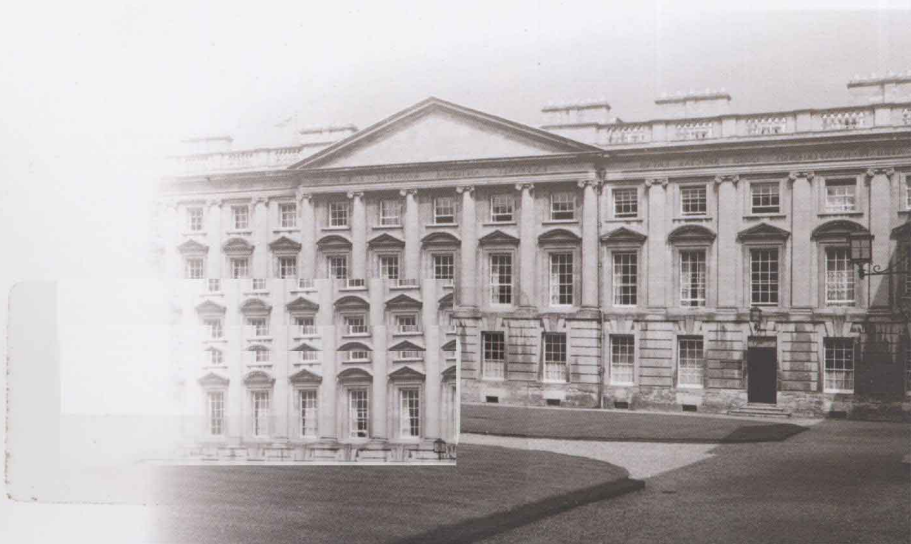
全世界的研究型大学都有着相同的职能——科研与教学。

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让出色的学术专家担任学校领导者与大学表现两者之间有无关联？诸多证据表明，这个问题的核心结论是：研究型大学的领导者应由一流的学者来担任。

Amanda H. Goodall 著

孙蕾 沈悦青 译

冯倬琳 校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一流大学研究文库

世界一流大学： 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吗？

Amanda H. Goodall 著
孙 蕾 沈悦青 翻译
冯倬琳 校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高等学校的领导者,尤其是校长,对于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选择谁来担任研究型大学的领导者已受到高等教育系统内外各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出色学者和职业管理者谁更适合领导高校,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书以大学是否需要由科学家做领导者为核心问题,综合详实的领导者访谈资料和大量的定量数据,解读大学组织中领导者的表现及其专家特征与学校发展和领导者甄选之间的相关问题,并得出了越是出色的学者越有可能成为优秀领导者的研究结论。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高教系统中的政策制定者、高等教育管理人员、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以及教育发展执行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一流大学. 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吗? / (美) 古多尔(Goodall, A. H.) 著; 孙蕾, 沈悦青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一流大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13-06853-8

I. ①世… II. ①古… ②孙… ③沈… III. ①高等学校-研究-世界 ②高等学校-校长-研究-世界 IV. ①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1966 号

Copyright © 200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0-250 号

世界一流大学: 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吗?

Amanda H. Goodall 著

孙蕾 沈悦青 翻译

冯倬琳 校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2 字数: 202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30

ISBN 978-7-313-06853-8/G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Preface

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是知识创造的源泉和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否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是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一。一个国家要想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或者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有世界一流大学,并渴望在全球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争得一席之地。近年来,许多国家相继制订了打造“精英大学”的计划,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投入力度,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理应在强化全民族的创新意识、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985工程”重点建设的若干所名牌研究型大学肩负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使命,更应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如何建设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而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也成为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成果不多,而且处于缺乏系统整理出版的状态。这既不利于同行之间的深入交流,也不利于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指导实践。为此,本着面向世界、促进研究、推动建设的宗旨,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决定以自身的科研力量为基础,吸收国内外从事相关研究的名家参与,组织出版“一流大学研究文库”。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5年的高等教育研究所。

长期以来,形成了针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定量实证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的鲜明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一直是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1993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专著《世界一流大学研究》,1999年又出版了《攀登——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进入21世纪,我们完成了一系列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主题的政府咨询报告,其中“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等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教育或科技行政部门以及高校的好评和重视,对加快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2004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命名为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2005年6月,我们发起并主办了“第一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2007年11月主办了第二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2009年11月主办了第三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2011年将迎来第四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一流大学研究文库”已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我们深信:“一流大学研究文库”的出版,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研究,对加快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也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念才

2010年7月于上海

致 谢

在完成这部书的过程中,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都友好地给我提供富有思想的帮助。一些素不相识的学者也阅读了我的作品,并提出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在此,我向所有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三位给予我极大鼓励的学者:康奈尔大学的 Ron Ehrenberg,拉夫堡大学的 Charles Oppenheim 和哈佛大学的 Henry Rosovsky。还要感谢 James Adams, Warren Bennis, Alan Bryman, Paula Marshall, Robert May 和 Mark Taylor 对我的慷慨支持。本书是以我在华威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修改和润色而形成的。为此,我要向我的导师们,华威大学的 David Wilson 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 Stephen Machin 表示由衷谢意,还要感谢华威大学商学院院长 Howard Thomas 对我的帮助。

对大学校长们的访谈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本书的内容。我要向时间宝贵却依然接受我访谈的英国和美国的大学校长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是: George Bain, Derek Bok, Glynis Breakwell, Robert Burgess, Yvonne Carrer, Kim Clark, Ivor Crewe, Howard Davies, Anthony Giddens, Alan Gillbert, David Grant, Amy Gutmann, Patrick Harker, John Heilborn, John Hood, Jeremy Knowles (不幸于 2008 年 4 月逝世), Paul Nurse, Andrew Pettigrew, Henry Rosovsky, David Skorton, Lawrence Summers, Richard Sykes, Eric Thomas, Nigel Thrift 和 Bill Wakeham。同样,我要感谢接受我访谈的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人士: Maurice Dwyer, Peter Oborn, Kieran Poynter, Graham Shuttleworth, Paul McGrath 和 John Silver,还要感谢在个案研究中协助我进行访谈工作的专题小组成员。

感谢我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本书的一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做研究员期间给予我有益建议的 Rose Batt, Fran Blau, Robert Frank, Kevin Hallock, Alice Isen, Kirabo Jackson, Larry Kahn, Darrie O'Connell,

Robin Remick 和 John Sipple。同样感谢苏黎世大学(本书成稿的所在地)的 Uschi Backes-Gellner, Josef Falkinger, Egon Franck, Andrea Schenker, Liliana Winkleman 和 Rainer Winkleman。感谢 William Bowen 和其他学者对本书初稿提出的充满启迪和鼓励的评论。

还有许多人都曾给予我有益的建议,他们是: Philip Altbach, Jon Baldwin, John Benington, Mary Blair, David Blanchflower, Lisa Boudreau, Sara Brailsford, Sue Bridgewater, G. D. A. Brown, Alison Browning, Richard Chait, Bruce Charlton, Cathy Charlton, Alison Cheevers, Andrew Clark, Simon Collinson, Megan Comfort, Rachel Condry, Scott Dacko, Rosemary Deem, Kate Dodd, Carol Douet, Chris Edgar, Dan Gilbert, Helen Goodall, Philip Goodall, Liam Graham, Paul Greatrix, Hugh Gregory, Keith Grint, Vin Hammersly, Mark Harrison, Jean Hartley, Judith Higgin, Diana Holton, Janice Isaac, Paula Jarzabkowaki, John Leighfield, Kate Malleson, Robin Middlehurst, Sharun Mukand, Abhinay Muthoo, Dennis Novy, Brendan O'Leary, James Oswald, Reeve Parker, Simon Peatfield, Anita Phillips, Leah Popowich, Nick Powdthavee, Leah Rosovsky, Lucio Sarno, Sarah Shalgosky, Stephen Sharp, Michael Shattock, Swaran Singh, Ken Sloan, Mark Smith, Bridgette Sullivan-Taylor, William Swann, William Taylor, Larry Treanor, Michelle Tytherleigh, Claire Visser, Mary Visser, Michael Whitby, Gareth Williams 和 Lyuba Zolotava,感谢他们。

我还要感谢华威大学商学院(Warwick Business School)为我提供科研奖励,感谢 Janet Biddle, Sheila Frost, Lindsey Marr 和商学院市场与战略管理小组(the Marketing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Group)对我长年以来的支持,同样感谢高效组织研究办公室(Warwick's super-efficient research office)的 Debra Bennett, Katherine Branch, Nikki Muckle 和 Lisa Wilberforce。感谢英联邦大学联合会和高等教育统计署(the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在数据收集方面对我的帮助,感谢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in the United Kingdom)在我进行研究的全过程中提供的慷慨资助。

我 16 岁就离开了学校,且没有获得任何证书。时隔十多年后,我在 33 岁时得到了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的机会。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在伦敦经济学院给予我有益质疑和良好教育的人: John Carrier, Stan Cohen, David Downes, Jane

Falkingham, Julian le Grand, Bob Pinker, Paul Rock 和 Sally Sainsbury。

我要感谢本书的主编 Richard Baggaley, 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还有他的幽默), 也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工作人员: Peter Dougherty, Caroline Priday, Heath Renfroe, Kimberley Johnson 和 Dawn Hall。非常感谢我所有的新老朋友和我的家人, 感谢他们给我的关心、爱护还有帮助。最后, 我还要感谢我的伴侣 Andrew Oswald——我想这种感谢并不俗套, 如果没有他的慷慨激励和充分耐心, 我将无法写完这本书。谨以此书献给他。

前言

Foreword

本书主要讨论专家型领导的问题。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大学校长身上——但并不局限于他们。我们研究的问题是：让一位研究成果引用率高的学者成为某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对这所大学的表现是否有重大影响？我们尝试通过相关证据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越是出色的学者越有可能成为优秀的领导。

在研究中，我们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友人的许多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对此表示深深感谢。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确信：学者不能成为出色的管理者或领导者，我对此持有异议。这一被大肆宣扬的观点多来自一些大学学者、行政人员和大学体系之外的政客、公务员、商人等。美国一所一流大学的校长对我提到过这一观点，而且很多几乎从未涉足高校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足见这一观点在社会上已经泛滥成灾。而当我询问起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时，校内的教员们常常会讲述某位前任系主任的轶闻琐事，校外的人士则普遍认为在学术上天赋异禀的人必然在人事组织能力上有所欠缺。

也许有人会批评大学在培养教师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在研究型大学中，系主任通常每隔几年就进行轮转，而一般对于教授来说，他们常常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指导就直接迈上或者被推上领导者的岗位。此外，还有另一不同观点，比起从事管理或者领导的人士来说，学者在此方面却不擅长。我常常通过举例来反驳这类观点：假设随机选取护士、律师、厨师、广告经理、工程师、记者和学者各100位，难道能发现某种职业的从业者天生就是出色的管理者吗？难道管理技能更应该通过培训和经验而习得的吗？难道管理的才能不是较平均地分配在各种职业的从业者当中吗？（也许在领导方面有些不同罢了。）但我认为如果说学者生来就不擅长管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大学组织作为社会当中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受人尊敬的机构，如果学者们真的在管理和领导方面百无一益，那么大学怎么能够实现高效运转，怎么能够经受住资金削减和外界不断干涉

的考验呢？

全世界的研究型大学都有着相同的职能——科研与教学。本书仅对大学的执行主管即校长(通常称为 Presidents, 在有的国家也称为 Vice Chancellors 或 Rectors)进行论述。我认为这是一所大学中最重要的职位, 尽管我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些是院长, 但我的资料主要是关于大学校长的。此外还包括论述商业学校的一章和大学董事会的一章, 从事非学术工作的行政人员在大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就像粘合剂, 把所有的零部件都粘合成一个整体。对于他们的职能, 本书暂不讨论。我相信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向各个国家推广。

本书综合了定量数据和访谈材料结合的研究方法。笔者试图深入浅出地使用定量数据, 也为善用数据者提供充足的数据信息。本人认为本书既有学术性, 又兼具应用性。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领导学相关研究, 有助于人们理解研究型大学, 也希望本书的结论可以对那些想要选聘大学领导人的董事会和猎头们有所启发。

最后, 我想对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做些说明。对于研究生而言, 常常是以某一学科作为途径进入某一学术领域, 因此, 他们会用某一特定的理论和方法论视角来看待问题。作为博士生, 我能够另辟蹊径, 要感谢导师对我的支持。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问题正待解决, 然后根据问题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我的学术起源于商学院, 我觉得自己从本质上讲是一名管理问题的研究者, 而我也从其他学科中得到了许多启发, 尤其是经济学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 教育学家们也给予我很多启发, 此外心理学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论点	1
第二章	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者	25
第三章	一流商学院的院长	43
第四章	学者型校长提升大学实力：是否存在纵向依据	51
第五章	大学为何选择学者做领导？	74
第六章	大学领导者是如何选出的？	102
第七章	体育与艺术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型领导者	120
第八章	结论	132
附录 1	数据收集	135
附录 2	文献计量学数据	140
附录 3	大学样本与商学院样本	145
附录 4	欧洲诺贝尔奖获奖人数的减少	152
附录 5	院系分析(英国研究评估考核中排名前五的院系)	155
附录 6	一位系主任的建议	159
	参考文献	161

第一章 论 点

公元 870 年前后,在英格兰的剑桥(the river Cam)上架起了一座桥。1209 年,那个当时被称为剑桥的地方建起了一所大学——它是世界上诞生最早的大学之一。近八百年之后,剑桥大学委任了它的第 344 任,也是最近一任校长(President 或者 Vice Chancellor^①),Alison Richard。她是剑桥大学的第一位女性校领导。作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她的学术生涯是在耶鲁大学度过的。2003 年,她辞去了耶鲁大学教务长(Provost)的职位来到剑桥大学。仅一年之后的 2004 年,另一所历史悠久的英国大学——牛津大学任命 John Hood 为第 27 任校长。他是该校自 1230 年以来第一位不是出身于牛津大学内部学术系统中的校长。事实上,这位新西兰人也不是一位学者,他主要从事商业:^②

为什么剑桥和牛津这两所古老的高校会选出两位如此不同的学校领导者呢?

就在 Alison Richard 踏上东行之旅的同一年,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 Paul Nurse 离开英格兰来到纽约,出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第 9 任校长。在美国一流大学中,由诺贝尔奖得主担任校长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2006 年退休的加州理工学院(the California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前校长 David Baltimore 就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校长 J. Michael

① Vice Chancellor, President, Rector 一样,是主管学校学术和行政事务的官员或首席执行官。本书中用“President”一词来指代大学的领导者,虽然书中也用到了其他的表示校长头衔的词汇,但意思是一样的。

② 有趣的是,在撰写本书时,牛津大学宣布由耶鲁大学的另一位前任教务长 Andrew Hamilton 取代 John Hood 来担任校长。

Bishop 也是如此。确实，在加州有不少大学都任用世界上最著名的学术专家担任学校领导。像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的校长 John Hennessy 是一位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C Berkley) 的加拿大裔校长 Robert Birgeneau 则是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the UC San Diego) 的校长 Marye Anne Fox 是著名化学家，而享有盛誉的大气科学家 Ralph Cicerone 则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the UC Irvine) 的校长，直到 2005 年才离开学校赴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或许加州大学体系是世界上的公立大学中最好的体系之一（尽管目前它正遭到州政府的重大财政削减），加州孕育了众多伟大的学府。人们常常把加州大学系统获得的成就归功于它的创立者兼首任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Clark Kerr。

是否可以认为：加州众多高校的成功一部分归功于克尔引入的学术标准，另一部分则归功于许多曾经担任过加州大学学校领导的知名学者所传承下来的底蕴？

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让出色的学术专家担任学校领导者与大学表现两者之间有无关联？诸多证据表明，这个问题的核心结论是：研究型大学的领导者应由一流的学者来担任。

研究型大学对领导者的选择为何事关重大？

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假设是：世界需要杰出的研究型大学，因此，由什么样的人担任校长关系重大。^① 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公共事务或大学科研的资金投入可以衍生出一种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的外部效应，这种积极影响是通过研究型大学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而发生的。当某个个体或组织的创新或知识向外部扩散，并带来创新和知识的增长时，这种“溢出效应”便产生了。可以说，睿智的思想感染了别人。研究型大学会产出多种知识型外部效应（也会产出非知识型的外部效应，如工作机会），其中最重要的产出是创造发明和先

①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高等教育机构不重要，只是这些是我所熟悉的。本书我采用了卡内基基金会为改进教学而撰写的报告《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来定义研究型大学。报告中提到，研究型大学需要开设完整的本科课程，通过培养博士生来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给予研究以高度的优先权，在任命、提升教师或授予终身职位时把科研能力作为主要条件 (www.carnegiefoundation.org/classifications)。

进的思想。^① 政府对科研和发展的投资直接带动了地方和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学的科研对于工业、研究与开发、新技术的形成以及新兴企业的创新与扩张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顶尖科学家的分布与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办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度。^② 简而言之,整个社会似乎都从学术研究中受益良多。

大学的研究成果还带来了其他一些更为微妙的益处。在医学、物理、化学或精神病学方面不断的新发现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能够促进教育发展,能够改善贫困与歧视。这种影响作用如何被量化呢?对于历史长河中的文明,我们究竟了解多少?艺术与人文为人类带来何种充满美感与创造性的贡献?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学在寻求摆脱政府和权力集团的影响,独立地创造和传播思想。这种用客观视角看待问题的特征早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揭露被各种官方解释所掩盖的气候变化的事实真相,所有这些大学的外部效应和溢出产物都无法定量地计算出来。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领导和管理一所大学的最佳方式究竟是什么?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大学的国际化和日益增强的竞争力。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终将导致其领导人的角色和职责转变。^③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大学和其他公共部门都奉行“管理主义”至上的信条,在某种程度上,本研究受到了它的触动。似乎大家普遍认为由管理者担任领导者是较好的选择。本书论证了如下观点:多数大学员工都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学术背景,让一名同样具有学术背景的专家来担任学校领导者将更有利于院校的长期发展。同样,大学或其他知识性部门的领导者应当具备高超的管理能力,而这种管理能力必须建立在具备能为大众接受最低水准之上的

① 教授学生也是大学的一项重要产出,不过有证据表明,在大学教育中受益更大的似乎是学生个人而不是整个社会(来源于 Krueger and Linn Dahl [2001] and Oreopoulos [2007])。正因为如此,考虑到获得大学学位对学生今后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我认为国家不应该过多地补助本科学学生(研究生另当别论)。但我们应该为那些因贫穷而交不起学费的学生提供充裕的奖学金。

② 关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资料来源于 Lucas(1988)。关于大学和公共科研的经济效益,资料来源于 Adams(1990) and Adams and Clemmons(2008); Anselin, Varga and Acs(1997, 2000); Basu, Fernald and Shapiro(2001); Basu et al. (2003); Cohen, Nelson and Walsh(2002); Aghion et al. (2005); Aghion(2006); Stuenkel(2007); Bramwell and Wolfe(2008)。关于顶尖科学家和生物科技公司数量增长之间的联系,资料来源于 Zucker et al. (1998)。关于大学毕业生如何使当地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薪水增加,资料来源于 Moretti(2004)。关于顶尖学者和科研团队的规模对科学产出与影响之间的关系,资料来源于 Adam et al. (2005)。

③ 我们可以从一些不同时期的文献中得出这个结论,如 Bowen and Shapiro(1998), Bargh et al. (2000), Bok(2003), Bornstein(2003), and Shapiro(2005)。

学术能力的基础上。相比之下,本书后面使用的数据表明领导者的学术水平与大学的质量高低呈现出一种近似线性的关系,即学术水平越高,大学的质量也越高。

之前,有人对大学校长的角色和其教育与职业经历方面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①不过较少有人把研究聚焦于学术专家型领导者的学术背景上。是否选择知名学者当校长的问题在欧洲和美国都讨论已久。基本上每所大学在甄选和确定校长人选时都试图克服这个难题,不过目前似乎并未达成共识。

据笔者了解,本研究是首个用经验主义来论述此问题的研究。鉴于许多院校都把研究表现作为学校的中心使命,要通过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研究人员的学术声望来表现学校质量,因此,我们把目光转向其领导者的学术能力也是合乎逻辑的。

图1-1展示的是本书的中心论点,一个将任命学者为领导者与大学表现相关联的模型。如图所示,倘若某大学的主管部门把提高或保持本校的研究水平作为战略目标,那么聘用一位学者当校长或许是明智的选择。虽然这幅图把复杂的校长选聘过程描绘得较为简单,但它阐明了其中的要点并明确了主要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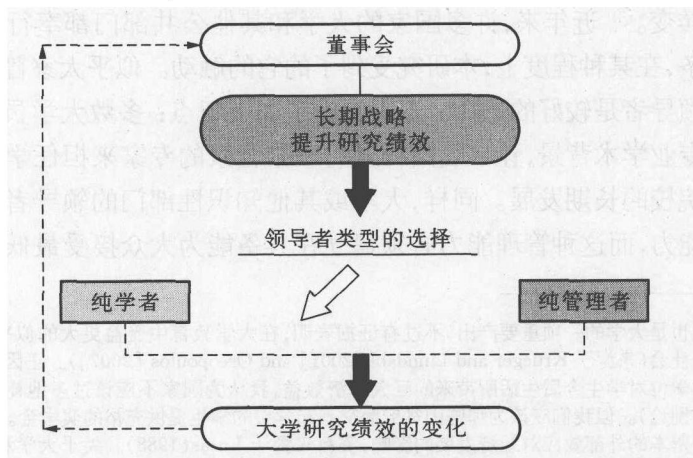


图 1-1 纯学者到纯管理者的任用图谱

① Szreter(1968); Halsey and Trow(1971); Cohen and March(1974); Taylor(1986); Tienrney(1988, 1989); Bensimon(1989); Rosovsky(1991); Middlehurst(1993); Bowen and Shapiro(1998); Bargh et al. (2000); Ehrenberg(2002, 2004); Brodie and Banner(2005); and Keohane(2006)。

本书从四个独立的资料来源获取数据。研究伊始,重点着眼于排名世界前100位的顶尖大学的校长,然后再聚焦于一流商学院的院长。接下来,尝试判断现任校长的特质能否帮助预测院校未来的成就。最后运用来自英美两国26位校长的访谈资料,尝试解释越优秀的学者越容易成为出色的大学校长的原因。对校长们的访谈材料将贯穿全书以阐明大学中的领导问题。表1-1列出了我所约见访谈的大学校长的名单。

需要提前强调的是,在这里学识并不等同于管理经验或领导能力。除了学识,一位“专家型”领导还必须在某个领域具备专门技能。同样,并不是说所有杰出的研究学者都必将成为优秀的管理者或领导。在达到职业巅峰之前,许多大学校长都担任过教务长、副校长或院长,抑或管理过某个重要的研究中心或实验室,通过这些经历获得管理方面的经验。在本研究中我所考察的400名学校领导几乎都有类似的管理经历。而且,一个人要想成为科系或者学院的领导人,他必须首先是该院系的高级教职人员——通常要成为终身正教授才行。只有在教职人员拥有了大量的出版作品时,学院才可能授予其终身教授职位。因此,学识已经成为在研究型大学担任领导的先决条件。本书所关注的是在这个基本点之上更深层次的问题。

因为一流大学往往把研究质量放在首位,所以在本研究中,我着重关注学者们的科研表现。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职业道路的前进离不开学术产出,也就是出版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出色的教学工作不重要,而是在研究型大学中要想获得升迁仅依靠教学是不够的。也许在把教学放在第一位的学院和大学中情况会有所不同。

教学和科研之间也有联系。教师以科研的成果为材料教授学生。有趣的是,能够证实优秀的研究者同样是优秀教师的证据较为有限。一所大学在英国研究评估考核(RAE)中的得分与其在教学质量评估(TQA)中的得分之间存在关联,两个得分之间的相关度很高。^①换句话说,那些在研究方面成绩最为出色的院校倾向于在教学方面同样具备最高的水准。^②

① Shattock(2003)。

② 最近,我带着这个问题(好的研究者是否就是好的教师?)对北美某大学的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得分进行了数据分析。第一步,我只得到被评分最高和最低的教师的数据。这一样本包括约50名教师,基本上平均分为两组。事情很快就清晰明了:在那些被贴上“差老师”标签的一组中,科学家占绝大多数,其中大都为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反之,“好老师”一组中则以人文社科的老师居多。这个现象很有趣,根据我们原先对欧洲和北美学生在学科上的偏好来判断,情况本不该如此。若要试图回答我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学科有更多的了解和掌握。

Henry Rosovsky 对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考虑，他指出：“从事研究，尤其是学术研究，是对人类持乐观态度的一种方式，……，相信进步并因此拥有理性乐观特质的人，也就是学者教师，更有可能充满风趣并成为更优秀的教授。他们较不可能用一些愤世嫉俗的或是反动的术语来教授自己的学科。”^①

Rosovsky 还认为多年从事同一门学科的教学很可能会造成教师的厌倦与精疲力竭，而从事研究不仅使得信息的更新与时俱进，还使教师不会“一提到教学就打瞌睡”。^②

这样一来，从事科研的人可能对自己的课题更有热情，从而也许会成为更好的教师。不过这个问题至今还是没有定论。

本书的核心论点

我希望本书所呈现的论证可以对那些参与甄选大学校长的人有所启示。科研与教学是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或者说是核心任务，这并不会随着国家的不同和时间的变迁而改变。关于为什么更优秀的学者会为大学带来卓越成就的讨论，我也采用了对 26 位大学校长的访谈材料来加以探索。^③ 表 1-1 所列即为接受访谈的美国和英国大学校长。

表 1-1 接受访谈的大学校长

美 国 的 大 学
Derek Bok,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
Kim Clark, 哈佛商学院院长
Amy Gutmann,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
Patrick Harker, 沃顿商学院院长
John Heilbro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任校长
Jeremy Knowles, 哈佛大学前任院长

① Rosovsky(1991, p. 89)。

② Rosovsky(1991, p. 90)。

③ 根据这些通过定量和定性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我可以对问题进一步扩展。我曾经在大学领导者身边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这段职业经历也给了我启发。